

《党史文汇》精选本

一代 天骄



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人民领袖爱人民

吕厚民 摄

1961年毛泽东在蚌埠车站会见列车乘务员，
与乘务员们亲切交谈。



思念毛泽东 祖增贵 刻



公仆风采

1959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代表在一起。

吕厚民 摄



——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目 录

血染边界——井冈山斗争风云录	桂玉麟(2)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三次“等待”	刘 良(7)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君子协定”	李永芳(11)
占寺姻缘	刘 良(12)
骄杨——杨开慧生平拾萃	成 武(14)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纪事	邹书春(21)
疾风瘦竹——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前后	史辉华(25)
陈毅主婚	胡居成(28)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闪光纽带	叶文琴(31)
徐向前在风雪长征路	于 东(34)
“板荡识诚臣”——叶剑英长征建奇功	朱贵强(38)
毛泽东在他妻弟被杀之后	白明高(40)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	何 定(41)
刘伯承“月下追韩信”	陈石平(49)
尊重、关心、任用、照顾——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知识分子	范 凌(50)
毛泽东在陕北度过的最后一年	晋申钊(52)
贺龙巧借“10 万天兵”	乘 荣 晓 笔(63)
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日日夜夜	岚 叟 李 丁(66)
秘密行动：新疆和平解放前夜	李 渊 张 宁(87)
中美战略决策的较量——记抗美援朝战争头八个月	张 晖(90)
周恩来和万隆会议	熊华源(99)
中国“乒乓外交”的高层决策	官 力(102)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生活琐记	曹登国 口述 文俊 孟然 整理(106)
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云 中 孟 然(108)
许光达让衔	陈永新(110)
“到了苏联，不要去吹嘘‘大跃进’”——忆陈毅同志的一次谈话	马 烽(113)
刘少奇在他最后的日子	侯 军 章鸿仲(115)

主 办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 编 郗 毅
副主编 孙研真
编 辑 《党史文汇》编辑部

编 审 杨小池 朱嘉峰
印 刷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
发 行 《党史文汇》发行组
定 价 3.90 元



——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目 录

血染边界——井冈山斗争风云录	桂玉麟(2)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三次“等待”	刘 良(7)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君子协定”	李永芳(11)
占寺姻缘	刘 良(12)
骄杨——杨开慧生平拾萃	成 武(14)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纪事	邹书春(21)
疾风瘦竹——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前后	史辉华(25)
陈毅主婚	胡居成(28)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张闻天与毛泽东之间的闪光纽带	叶文琴(31)
徐向前在风雪长征路	于 东(34)
“板荡识诚臣”——叶剑英长征建奇功	朱贵强(38)
毛泽东在他妻弟被杀之后	白明高(40)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	何 定(41)
刘伯承“月下追韩信”	陈石平(49)
尊重、关心、任用、照顾——聂荣臻与晋察冀根据地知识分子	范 凌(50)
毛泽东在陕北度过的最后一年	晋申钊(52)
贺龙巧借“10 万天兵”	乘 荣 晓 笔(63)
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日日夜夜	岚 叟 李 丁(66)
秘密行动：新疆和平解放前夜	李 渊 张 宁(87)
中美战略决策的较量——记抗美援朝战争头八个月	张 晖(90)
周恩来和万隆会议	熊华源(99)
中国“乒乓外交”的高层决策	官 力(102)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生活琐记	曹登国 口述 文俊 孟然 整理(106)
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云 中 孟 然(108)
许光达让衔	陈永新(110)
“到了苏联，不要去吹嘘‘大跃进’”——忆陈毅同志的一次谈话	马 烽(113)
刘少奇在他最后的日子里	侯 军 章鸿仲(115)

主 办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 编 郗 毅
副主编 孙研真
编 辑 《党史文汇》编辑部

编 审 杨小池 朱嘉峰
印 刷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
发 行 《党史文汇》发行组
定 价 3.90 元

军物资补充不利,这是三。”

“毛泽东列举的道理无懈可击。看来,只能动用组织手段了。”杜修经在琢磨着,怎么样完成省委交代的任务。还在离开省委时,他就意识到,井冈山之行并不轻松:一则毛泽东很有头脑,不是随便可以调遣的;二则还在前几天,湖南省委满口赞成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完全支持朱、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然而,一个星期还不到,省委就推翻了自己的意见,让红4军远征湘南,这怎么好说服毛泽东、朱德呢?起初,他真不想接受这项任务,但从组织观念出发,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来井冈山。

杜修经一脸严肃地说:“润之兄,你提出的3条理由,可以保留。省委既然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们只有坚决地服从。”

毛泽东摊开双手,苦涩地说:“这样吧,今天晚上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让大家对省委的指示进行充分讨论,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陈毅的发言打断了毛泽东的回忆,陈毅激动地说:“我同意玉阶兄的意见。省委认为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事实上,并不象省委所说的那样。我们红4军所到之处,群众还是冷冷清清的,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这也说明,大革命失败的创伤,在相当多的地方尚未愈合。至于反革命的力量,也不象省委所说的那样脆弱,应该说,湖南的统治阶级还相当有力量,所辖军队不仅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战斗力也不弱。不似赣敌易破。在这样的情况下,红4军去湘南只能是冒进,有百弊无一利。”

杜修经急忙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说:“你们提出种种理由不同意红4军主力去湘南,这是保守主义在作怪,井冈山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大发展前途?要防止作茧自缚啊!”杜修经希望通过扣上一顶帽子,扭转会议的气氛,但却适得其反。朱德首先起来反驳:“我们在井冈山坚持斗争怎么能算保守主义呢?难道乱拼乱打、盲目瞎干才不叫保守主义!其实,真正有害革命的,恰恰是那种只求一时的声势,全不顾基础的巩固,结果,敌人一反攻,一败涂地,一无所有。现在,我们建立以宁冈为大本营的巩固根据地,是发展胜利、夺取政权、赢得胜利的必由之路,丝毫没有有什么保守主义可言!”

朱德铿锵有力的反驳,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毛泽东抽着烟,对大家的发言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他心想,经过湘南暴动失败的挫折,大家对党内存在的盲动主义倾向,识别能力有了明显长进,而且也说明自己的观点是有群众基础的。他灭掉手中的烟头,概括了大家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讨论,我们认为湖南

省委关于要求红4军主力远去湘南的决定,是不切实际的,是于党的事业不利的。红4军仍应继续留在边界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毛泽东短短的几句话,掷地有声。袁德生没有再说什么,杜修经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满脸通红地说:“你们的组织纪律性都到哪里去了?难道就这样随随便便推翻省委的决定!”

对杜修经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在会前就考虑到了。他认为,一方面要抵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避免革命事业遭到损失;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方式,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他认真地对杜修经说:“我们想以红4军军委、湘赣两特委的名义,写专题报告给省委,陈述我们的理由,建议省委更改原来的决定。”

“毛泽东确实厉害,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称得上滴水不漏呀。”杜修经心里这样想着,虽然脸上没有表露什么,可内心对毛泽东由衷地钦佩。

冒进湘南

7月中旬,一个庄稼人装束的年轻人,在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上疾走。他一边匆匆赶路,一边警惕地留心着四周的动静。他就是茶陵县委书记江华,正由永新赶往酃县,把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朱德、陈毅。

6月30日永新联席会议之后,湘敌第8军吴尚部会同赣第6军胡文斗部、第9师杨池生部,协力进攻井冈山。

红4军军委得知敌情后,7月9日晚在永新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4军主力开赴宁冈,迎击湘敌,阻止湘赣2敌会合。由28团、29团组成的红军大队在朱德、陈毅指挥下,赶走了宁冈的湘敌。接着,他们乘胜追击,打算袭击湘敌之老巢酃县、茶陵2县。一路上,红军大队进展顺利。12日攻占酃县县城。

部队到了酃县后,一部分战士闹起了思想情绪。29团系湖南宜章农民组成,思家心切,他们借口湖南省委有指示去湘南发展,因而吵吵闹闹,要求不回永新、宁冈,而去湘南。这个团的一部分士兵还秘密召开士兵代表会议,擅自确定了出发时间,找好了向导。

“这怎么行,党组织已经作出了决定,29团有什么权利擅自去湘南!”朱德听到反映后很生气,马上派人去做29团士兵的工作。

“朱军长,我们一方面做士兵的工作,一方面立即写信给毛委员,把情况向他报告。”陈毅也很焦急地说。

“好,以我们两人的名义,立即写信给毛委员。”朱德取出笔墨,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永新接到朱德、陈毅的来信后,也感到事态严重。他召来宛希先、何挺颖等人,和他们商量后写一封回信给红军大队。毛

泽东在信中强调,目前的形势发展,非常有利于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如果此时远离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几个月的奋斗又将付之东流。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7月4日以红4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写报告给湖南省委,提出不去湘南的具体理由。在省委未正式答复前,不能擅自变更主张,盲目把队伍拉至湘南。他要求朱德、陈毅多做工作,说服29团指战员,放弃去湘南的错误想法。还希望省委代表杜修经,配合做好说服工作。

写好信后,毛泽东对江华说:“这封信很重要,关系到红军大队的安危。你务必尽快找到红军大队,当面交给朱德军长。”

江华把信放在贴身处,昼夜兼行,赶到了酃县县城,把信交给了朱德。

“毛委员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按他的要求做好士兵的思想工作。”朱德看完来信后满脸喜色,连日来的锁眉也舒展开来。

“修经同志,你也要配合我们做好工作呀。”陈毅把信给杜修经看了一遍。杜修经看完来信后没有引起什么激情。事实上,29团吵着要去湘南,正合他的心愿。6月30日的紧急会议之后,杜修经主动要求和红军主力一起行动,打算趁红军大队远离毛泽东之际,寻找机会把队伍拉去湘南。当29团闹情绪时,杜修经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转机,因而竭力在私下鼓动。可是杜修经万万想不到朱德、陈毅会写信给毛泽东,让远在永新的毛泽东帮助他们做工作。

根据毛泽东来信的精神,朱德、陈毅继续苦口婆心地做29团的说服工作,29团终于同意和28团一起返回宁冈。可是,走了一段路,他们又叫起了“打回老家去”、“打回湘南去”的口号,不愿继续前进。28团提出要去赣南。

一个团要去湘南,一个团要去赣南,朱德、陈毅感到情况严重,在小范围内又一次研究对策。在一间小房子里,朱德、陈毅、杜修经以及28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等人围在一起,分析战士的思想动态,决定红军大队的行动方向。

战士中出现的种种思想情绪,与6月下旬湖南省委的那个错误决定关系很大,朱德想到这些,心情很不平静:“糟透了,简直是糟透了。这样下去,这支部队会垮掉。瞎指挥,全是瞎指挥。”

陈毅的心情和朱德一样不好受:“红军大队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只有我们这些人统一了思想,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身兼红4军参谋长和28团团长的王尔琢,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根据目前情况,要做好29团士兵的工作,并非易事,与其让他们吵闹不休,不如同意他们去湘南,28团也跟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在途中再见机行事,把部队带

回边界。”

何长工接着王尔琢的发言说了下去:“依照目前的状况,参谋长的建议可以考虑。虽然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总比无休止地争论下去要好得多。”

朱德用赞赏的目光朝他们看了一眼,下了最后的决心:“这样也好,既保住了这支部队,避免了分裂,也可在沿途开展工农运动和对敌斗争。”

17日,红军大队从酃县水口出发,折向湘南。24日,先期到达郴州的29团,自行攻击驻守郴州的范石生的一个补充师,并很快占领了郴州。

“糟糕,怎么去打范石生部队呢!”朱德闻讯,急得直跺脚。早年在云南讲武堂,朱德和范石生是同窗好友。1927年底朱德部队处在最困难时期,范石生曾给予大力资助。红1军成立后,范石生对剿共也不很热心。现在反过头来去打他的部队,这不是自己堵自己的路吗!朱德正要下令29团撤出县城,却传来了红军大队在郴州城外遭到失利的消息。原来,当范石生得知红4军打败补充师,十分气愤,忙派两个主力团来增援。在内外夹击下,红军大队仓促应战,向后败退。

29团撤出战斗后,不听指挥,向宜章方向转移。团长胡少海竭力劝阻,不起作用,结果,一部在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章部消灭,一部散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下落。当天胡少海多方寻找,只搜集到一百来人。28团虽然未遭很大损失,士气也极其低落。面对着红军大队的悲惨遭遇,朱德无比气愤。他火冒三丈地对杜修经说:“到湘南来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这一点你看清楚了吧!作为指导机关,不了解下情,不多听一听下面的意见,行吗?!”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红4军损失了1/3的兵力,朱德的愤慨与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出迎大队

红军大队冒进湘南之时,井冈山军民实践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粉碎了江西11个团的敌兵进攻,士气大振。正在这时,湖南省委又派袁德生来边界,要求红4军毫不犹豫地

向湘东发展。

“向湘东发展?”毛泽东一怔,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因为,由28团、29团组成的红军大队远离边界,至今不明下落。目前,只留下31团和32团在边界坚持斗争。这两个团都只有2个营的建制,加起来才1000多人。何况32团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而成的,战斗力不是很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往湘东发展呢!可是,湖南省委毕竟是领导机关,有权调遣井冈山的部队。到底怎样处理,毛泽东感到有点左右为难,不好贸然决定。

“泽东兄,把特委几个成员找来议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杨开明提议。比毛泽东小

31团的杨开明，是杨开道的胞弟，被湖南省委派来边界代理特委书记。

第三天，特委扩大会议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陂村召开。毛泽东、杨开明、袁德生以及31团、地方党负责干部20余人参加了会议。袁德生是第二次来边界，讲起话来自然比上一次要随便得多。一开始，他把省委的意图向大家讲了一番：“最近，省委分析了湖南全省的形势，认为湖南军阀的政治已经到了异常混乱的状态，统治阶级的力量是非常之薄弱。与此同时，工农运动更加高涨，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因此，希望红4军坚决地向湘东发展，迅速地取得萍乡、安源，建立湘东各地的武装割据。”说完，他把省委7月20日给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念了一遍。省委在信中认为，红4军往湘东发展，“是绝对的正确，应该很坚决的执行。”

毛泽东一边听袁德生念信，一边在脑中回忆省委近来对边界斗争的几次指示。6月19日湖南省委给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发出指示信，同意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可是，仅仅隔了一个星期，在26日又主张红4军主力向湘南发展，以求实行湘南的武装割据。一个月还不到，省委这次又命令红4军开往湘东，和平江、浏阳、安源等地的斗争取得联系。指导机关这样不顾边界的实际情况，轻易地变更主张，怎么得了！

毛泽东越想越生气，接二连三地问袁德生：“既然省委对湖南的局势作了精辟的分析，那么，湖南的工人运动到底如何？农民运动又有什么新的特点？城市斗争开展得怎么样？有无罢市、罢工、罢课？国民党的士兵运动又有什么新的进展，有无士兵起义、哗变？”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上述问题，袁德生都无法回答，只能“这个、那个”地吱唔一番。其实，他心里也很清楚，目前全国还处于革命低潮，新的复兴还没有到来。尽管各地发生了一些工农斗争或武装暴动，但都是局部的，规模也不大。而且，在敌人进攻面前，不少都遭到了失败。因此，把湖南统治阶级看作“一钱不值”，把工农群众斗争说成“异常高涨”，还为时尚早。即使对井冈山地了解，省委也是一鳞半爪。

看到袁德生一副尴尬相，毛泽东的火气来得更大：“对全省的情况不了解，就轻易地作出结论。靠这样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来指导革命，能不出差错吗？！”

这时，从外面急冲冲进来一个农民，他汗流满面，衣衫湿透，边走边喊：“毛委员、毛委员——”

“噢，这不是贺礼昌嘛！你不是替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吗，怎么有空回来？”毛泽东一眼认出了贺礼昌，忙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急切地问，“红军大队怎么样？朱德、陈毅他们在哪里？”

贺礼昌“哇”一声哭了起来，然后断断续

续地说明了红军大队的遭遇。最后，贺礼昌告诉毛泽东，28团由朱德、陈毅带领占领了桂东县城，现在，他们仍在桂东一带活动。

“损失了一个主力团，占了红4军的1/3，这就是盲动主义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听后，激愤地拍了一下桌子，胸中涌出对盲动主义的无比愤恨。他喝了几口茶，点燃了一支烟，心情略为平静一点。沉思片刻，他向大家征求意见：“28团是红4军的骨干，不能再有意外了。我带领31团第三营立即去桂东把他们接回来，第一营留守永新，会同32团坚持斗争，保卫边界。”

“这办法好，当务之急是把28团带回来，这样才能让井冈山的红旗坚持下去。”杨开明非常赞同毛泽东采取的应急措施，谭震林、宛希先都表示同意。

“我离开后，建议让杨开明任特委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毛泽东对边界工作作了详尽的交代。

布置完后，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第三营从九陂村出发，不分昼夜地向湘南疾进，8月23日在桂东县城和28团会合。位于半山腰的桂东县城充满了欢乐和歌声。

看到毛泽东率领部队一路跋山涉水，前来桂东寻找红军大队，杜修经既高兴又羞惭。高兴的是，正当28团受到挫折、处境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及时赶到，从而挽救了这支经历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但是，29团被打散，28团受挫，跟自己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有着直接的关系，自己应负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杜修经怀着内疚的心情，上去和毛泽东握手：“润之兄，你们冒着危险，来桂东迎接红军大队，很不容易呀。”

一个多月不见，杜修经消瘦多了，脸上也是一付疲惫的神色。本想狠狠地批评他一通，一看这付模样，毛泽东淡淡地说了几句：“我们如果认真执行6月30日联席会议的决定，你们也不至于遭受此罪。”

“是呀，如果我们头脑冷静，从实际出发，多做指战员的说服工作，就不会有红军大队的失利，边界的斗争也将是一番新的景象。”杜修经仍然羞惭地低着头，对自己的过错进行反思。

此时，朱德、陈毅的心情也不好受。他们认为，在劝阻29团错误行动的过程中，军委显得软弱，态度不够坚决、果断。否则，也不会出现目前的局面。

杜修经马上作了补充：“更主要的是，湖南省委对边界工作的指导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又盲目地执行了省委的决定。”

对红军大队在湘南遭到失利的原因，毛泽东原先计划要很好地总结一下，现在他们已经自己作了认真的回顾、反思，于是，他征求朱德的意见：“我们是否撤离桂东，返回井冈山？”

“好，湘南不是我们久待的地方，应该早

日回到边界投入井冈山的斗争。”

当天，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离开桂东，向边界返回。

痛失战友

还在红军大队向桂东方向转移时，28团第2营营长袁崇全率领4个步兵连以及团部机关枪连、迫击炮连担任前卫。途中，袁崇全假传命令，把这支队伍带向江西崇义的思顺方向，企图脱离大队，投奔敌人。

“咦，方向不对呀？！朱军长说要到了桂东去，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不少战士感到情况不对头，纷纷议论起来。

“我们不能跟着瞎走，还是折到桂东去。”结果，第二营3个连以及机关枪连脱离了袁崇全的控制，安全返回大队。袁只胁带了两个连，继续向崇义方向开去。

400多官兵回到红军大队后，把情况向军部作了汇报。“不好，袁崇全有投敌的嫌疑。”朱德一听，立刻警觉起来。

“从他们走的路线判断，袁崇全很可能是去投奔国民党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王尔琢指着墙上的地图，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错，看来袁崇全有这样的企图。”陈毅点头赞同，而把目光停留在地图上崇义、上犹一带。

“朱军长，我去把他们追回来。”王尔琢向朱德、陈毅提出请求。

“我们已经损失了29团，再不能让28团有什么意外了，尔琢同志，你快去快回，无论如何要把两个连找回来。”朱德和陈毅交换了一下意见，同意王尔琢的请求。

王尔琢带了第3营，马不停蹄地追赶袁崇全，追了几天，没见踪影。这时，毛泽东带了部队和28团会合，然后一起离开桂东，进入江西崇义。

一天，他们遇到一个老乡。“老板，前面有没有队伍？”红军向群众打听。

“有。”老乡的口气很肯定。

“离开这里多远？”红军作进一步的了解。

“15里路左右。”

“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老乡作了具体的回答：3天前和你们一样，打的是红旗，穿的是灰布衣服。现在变了，在旗子上加了兰布、白星。”

红军一听，心里有了底，肯定是袁崇全，于是继续往前追赶。在思顺的一个村子，红军追上了袁崇全所带部队。军部立即命令第一营包围村子，防止袁崇全逃走。过了一会，王尔琢也赶到村外，他带了警卫员直奔村内，企图说服袁崇全返回大队。

此时，夜幕笼罩着大地，喧闹了一天的村子也渐渐寂静下来。王尔琢提着冲锋枪，边走边向村里的战士喊话：“我是团长王尔琢，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你们受了蒙骗，快跟我一起回去。”他还向袁崇全喊话：“袁崇全，你要

醒悟过来，不要成为革命的罪人。”

袁崇全深知，王尔琢在战士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突然出现，必定会使自己的计划彻底破产，袁崇全惊恐万分，一头是汗。“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王尔琢干掉。”袁崇全拿起挂在墙上的两支驳壳枪，推上子弹，往外冲去，没走几步，迎面遇上了王尔琢。

在夜幕掩盖下，王尔琢没有察觉袁崇全的满脸杀气，也没有看清他手上拿着什么。出于过去的友情，王尔琢想走上去相劝几句。可是，还未待他张口，一梭罪恶的子弹射了过来。王尔琢“啊——”地一声，倒了下来。

毛泽东、朱德听到王尔琢遇难的消息，悲伤的泪水溢满眼眶。“王尔琢是一个优秀人才，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的不幸遇难，是红4军的一大损失，是边界斗争的一大损失。”朱德眺望远方，强忍悲痛地说。

“是呀，才只有27岁，正是风华正茂、大展宏图的时候。”毛泽东的眼前，仿佛展现出王尔琢近几年走过的足迹。他是黄埔军校首届毕业生，1924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他无畏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此，在军事生涯中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建立了赫赫战功……

“为了井冈山这面红旗，牺牲了多少好同志！今天，在一长串烈士名单中又添上了王尔琢的英名。”朱德悲伤的心情，久久不能恢复。

“井冈山的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人民也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平时不易落泪的陈毅，眸内也溢满了热泪。

“我们要举行一个简易的悼念仪式，作为对王尔琢的怀念。”毛泽东表达了众人的心情。

初秋的太阳，在南方的丘陵地区不是那样灼热、燎人，大地依旧布满着热浪。第2天，在思顺东北方向的一座山岗上，一队官兵正在隆重地举行悼念王尔琢的活动。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向王尔琢的遗体致哀、告别。

在两棵大树下，挂着毛泽东写的一幅挽联：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
留却工农难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
得到解放方甘心。

毛泽东、朱德、陈毅、宛希先等站在王尔琢遗体的左侧，泪痕斑斑。

这时，边界遭到敌人蹂躏的消息，陆续传到了红军大队。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江西敌军乘虚而入，对边界人民大肆烧杀抢掠。顿时，从县城到平原，从湖南的酃县到江西的宁冈、永新，到处火光冲天，哀声遍起。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也乘机向贫苦农民反攻倒算……

（原载1992年第7期）

毛泽东

在中央苏区的三次“等待”

(江西) 刘良

全国解放初期，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的一篇讲话稿中指出：10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常常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每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的确，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度过了几次痛苦的“等待”过程。

1929年7月：毛泽东经历了第一次“等待”

还是在毛泽东率领红4军开创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期，当红军3次攻克龙岩胜利后，红军有了一个安定可靠的立足点。为了总结经验，加快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29年6月下旬，红4军前委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龙岩城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

当时，红军在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成分异常复杂，有的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接管过来的“解放战士”，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各种职业的群众。加上“中央二月来信”某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致使这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的认为党管一切的约束力太大；有的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而热衷于“走州过府”；有的要求部队搞极端民主化等等。对于这种种错误思想的出现，毛泽东在会上一条一条给予批驳，并认真劝导大家要扎下根来搞好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但是，此时各种错误思想已占上风，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大多数人不愿意听，有的还拿出各种理由与毛泽东直接顶撞起来。在大会最后选举红4军前委书记时，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

会后，毛泽东即离开红4军，一面养病，一面投入闽西根据地建设的斗争。

3个月过去了，红4军内各种错误思想不断泛滥，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恰此，中央要求红4军乘粤桂军阀混乱之机，将队伍拉到广东、广西去，配合那里的地方武装，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胜利区域。

当毛泽东得知中央的来信和红军的现状后，对红4军的前途十分担忧。红4军中大部分人本来就热衷于攻下几个大城市，过过胜利的好日子，中央的来信又正好让他们去攻打城市。这样，必定会葬送红军和根据地。在这危急之时，毛泽东的疟疾病却越来越重，两腿无力，浑身酸痛，但他此时怎么也躺不住，硬是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龙岩城。

到龙岩后，毛泽东立即找到朱德，要他正确分析两广的形势，不能盲从中央的指示。但朱德却以“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来回绝毛泽东的主张。各级军官听说毛泽东是来劝他们不要去打广东的，也都索性躲开。苦口婆心的劝说毫无效果，毛泽东又只好痛苦地离开龙岩，来到上杭继续养病。

一天，新任红4军前委书记的陈毅来到上杭。毛泽东一见陈毅到来，立刻从病床上爬起来，还没等陈毅坐下就急忙劝导他说：“广东去不得，那里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还比较弱，加上现在红4军内部思想比较混乱，那就更不能去了，千万要珍惜我们的队伍和这块根据地呀。”

陈毅本来是想劝毛泽东一起去参加打广东的，听毛泽东这一说，急忙用庄重的口气说：“毛委员，我刚从上海回来，我这是带了中央的指示请你一起去参加打广东的，其它事待打完这一仗再说。现在，我们不能把敌人的力量看得过高了，我们红4军也不能算弱了，打下广东，扩大点影响，这有什么不好？！”

“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总想一

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危险思想。”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声音越大，越说情绪越激动。陈毅发火了，大声说：“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说罢，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

毛泽东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他极力控制自己，慢慢地重新躺在床上。停了一会，毛泽东冷静而又坚决地说：“你们要打，你们去吧，我不去。”

陈毅看着毛泽东坚毅的神情，知道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说：“那好吧，我们先去打广东，等取胜回来再与你细谈。”

毛泽东点了点头。陈毅转身走了。

1个多月过去了。一天，陈毅又突然出现在毛泽东面前。陈毅抓住毛泽东的手，内疚地说：“毛委员，我们真不该不听你的劝告。”

毛泽东看见战友诚挚的表情，知道事情终于有了结局，忙急切地问：“我们的队伍现在在哪里，损失有多少？”

“我们部队到达广东时，粤桂军阀的斗争已经结束。我们在东江遇到了国民党的19路军。19路军派出3个师，紧紧咬住我们不放，红军损失大约有1个团。战斗失利后，红4军内部思想更加混乱，逃兵现象严重，现在部队往闽西开来。”陈毅喝了口水接着说，“出击广东前，我先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代表中央详细听了我的汇报，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来当。”说到这里，陈毅站起来，以极其诚恳的语调说：“朱德和我都希望你能早些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我现在是来接你的。”

毛泽东听了陈毅这一番肺腑之言，顿觉大病好了一半。他感激中央对自己的信任，更感激战友对自己的坦诚。

通过这次艰难的等待，换得了战友之间坚不可摧的友谊和信任，他们互相依附，互相支持，忠贞不渝，在以后的战斗岁月中，经受了种种严峻的考验。

1930年6月：毛泽东有过一次巧妙的“等待”

李立三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要全党同志都相信，“伟大的斗争将会在一瞬间爆发”，如果谁不相信，谁就该退出革命阵线；他命令各地工人举行暴动，各处红军集中攻打大城市，谁不执行他的命令，谁就该受到处罚。

1930年4月3日，李立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红4军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范围内扩

大主力红军，要把每一支枪都集中到红军手里，作好攻打城市的准备。尔后，李立三又接连向红4军发出指令，要他们立即放弃闽、粤、赣根据地，向长江流域推进。

在李立三三番五次的指令面前，朱德、陈毅等深感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知道不执行李立三的命令将意味着什么。他俩都不时地注视着毛泽东的态度。

只见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烦闷地来回踱步。他怎能轻易地丢开这块宝地，1年多来，红4军英勇奋战在赣、闽、粤边，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扩大了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成团成旅地消灭了大量敌人，摸索了土地斗争经验，深入了土地革命，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动摇了赣、闽、粤3省的反动统治，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开拓了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如今，既得不到中央的支持和肯定，反而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无理指责，还强令离开这里去打大城市，这不是前功尽弃吗？！

毛泽东劝导朱德、陈毅，不能盲从中央的指令，要坚持下来搞好根据地的建设，思想上不能动摇。

没过几天，李立三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批评毛泽东固守根据地建设的“极端错误的思想”。6月，又在中共中央《致红4军前委信》中指责毛泽东、朱德等“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完全是一种“农民观点”，“机会主义的观点”，要他们接到信后，“应当深刻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今后的路线”，“如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在李立三的指令面前，朱德不禁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起来。一天，他提醒毛泽东说：“我们这样硬顶下去，恐怕不好，是否可以往北挪挪？”

听朱德这一问，毛泽东心里不觉一惊。看来，红军内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承受不了压力了。如果朱德的思想一动摇，将会影响整个部队。想罢，便对朱德说：“中央要我们打南昌、进九江、攻武汉，凭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据悉，目前我党在武汉还只有200个党员，赤色工会也只有150个会员，而帝国主义在武汉的势力就有10个现代化师。南昌、九江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去打，那是鸡蛋碰石头。因此，我们要坚定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只要对中国革命有利，我们就要坚持，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但是，中央这样一再催促我们，如仍我行我素，恐怕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朱德回答说。

看来再行劝导已无济于事，朱德的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就只好跟着打吧。毛泽东想了想说：“也好，不过我们不能直奔南昌九

江,要一路打过去。我们的目的不在攻取南昌,而在于壮大我们的队伍,扩大政治影响。”

朱德微笑地点了点头。

次日,红4军发布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在向南昌推进的途中,红4军一路歼敌,一路发动地方武装,先攻占樟树,后又西渡赣江,攻占高安,然又折回南昌附近,拉开攻打南昌的架势,实际并不攻打南昌,而派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牛行车站鸣枪示威。耳闻阵阵枪声,毛泽东诙谐地对朱德说:“我们此举一为纪念3年前八一南昌起义的勇士们,二为表示我们执行了攻打南昌的命令。”说完,他俩哈哈大笑起来。

佯攻南昌之后,红4军又发布了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在向长沙开进途中,毛泽东、朱德等瞅准时机在浏阳文家市歼敌1个旅,尔后在浏阳永和市与红3军团胜利会师,组成了红1方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红1方面军组成后,革命力量大大加强了。此时,全军上下攻打长沙的呼声很高。毛泽东作为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对长沙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当时长沙城内几乎没有我党的组织,“全长沙仅八个失败情绪很深的党员”(1930年9月20日《彭德怀给中央的报告》)。这时红1方面军虽然有3万余人,但仍然是敌强我弱,不宜硬攻这个已有坚固设防的长沙城。但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无奈,他又只好继续跟着大家打。

当攻击长沙的命令发布以后,毛泽东再一次建议进攻长沙之前先扫清长沙附近之敌。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同意。因此,红1方面军首先在枫树河、新桥、龙头铺等地大量歼敌,广大指战员情绪更加高昂,歼灭长沙之敌更加急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防止盲目蛮干情绪的滋长,又劝导大家必须采取把敌人引出长沙城歼灭的办法。红军等了几天,守城之敌无动于衷,一部分人又急于吵着要总攻长沙城,毛泽东耐心说服指战员要有耐性等待。后来,终于引出敌人的1个师,取得了全歼该师的巨大胜利。后来,敌军再不敢越雷池一步,全军强攻长沙的请战情绪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签署了强攻长沙的命令。

强攻长沙的战斗开始了。红军战士象猛虎一样向敌人冲去。在敌军密集的弹雨下,红军战士倒下一片;不少战士撞在敌人的电网上倒下去。看着这些无私无畏的战士们毫不顾惜地用自己的身体去消耗敌人的枪弹而倒下,毛泽东的眼角溢出了痛苦的泪水:多好的战士啊,害死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等待不能持续下去,毛泽东坚决主张撤围长沙。

红1军团撤出攻占长沙战斗后没有几天,李立三派周以栗督战红1军团,要他们再度组

织攻占长沙,切断敌人湖南与武汉的联络。当夜,毛泽东与周以栗促膝交谈,力主中央放弃再攻长沙的主张,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信,陈述不再攻占长沙的理由,要周以栗带回去。然后,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折回江西,准备攻打吉安。

此后,为了稳定军心,统一思想,毛泽东通过会议和交谈,劝导大家认清形势,坚决抵制李立三错误的冒险主张,一直到罗坊会议,全军指战员对李立三错误路线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统一的认识,毛泽东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赣南会议后至遵义会议前:毛泽东 经受了一次艰难的“等待”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垮台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左倾的王明教条主义。他们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的特别器重,另一方面又特别自信自重。因此,当这些书生们随同中央机关陆续迁移到中央苏区时,便毫不客气地诋毁毛泽东的一整套主张,搬出了从外国学来的一条条“新观念”,“新理论”。

1931年11月1日,在瑞金叶坪召开的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直接进攻毛泽东,把毛泽东的各项主张说得一无是处,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反富农路线,反毫无理论基础、毫无远大前途的“狭隘经验论”,从而开始在党和军队中排挤毛泽东,以致步步削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来到瑞金。他是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一到瑞金,就利用他在理论上的所谓优势,将他学到的条条框框抛出来。他认为中国党和军队必须迅速布尔什维克化,而根据地的人民应该迅速无产阶级化,对以前那种“农民习气”的、非正规化的、山沟里的东西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总之,在他看来,毛泽东的那一套消除得越早越彻底,他的这一套才能迅速及时地推广实行。

开始,他们以毛泽东身体不好为理由,决定让他到离瑞金城大约20余里的东华山古庙里去休养一段时间。

毛泽东“顺从”地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山顶小庙。对于送上山来的每一份文件,每一张报纸,他只字不漏地认真阅读,有时还反复看几遍。当他听到红军攻打赣州不克、伤亡惨重的消息后,眉头紧锁,心情沉重。

一天,项英带着警卫员急匆匆来到东华山。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急切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

攻打赣州的战斗。”

听完项英介绍赣州战斗的情形后，毛泽东立即冒雨下山，赶往赣州前线。到了前线，毛泽东力陈自己的主张，说明攻打赣州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攻城部队转移到外线休整。

毛泽东的这次“越轨行为”，把博古等人搞火了。在事后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上，他们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开展“及时和无情的打击”，毛泽东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自然让他们罢免了。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1933年初，随着临时中央的迁入，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不久，罗明被责令停职反省，邓小平、毛泽覃、谢唯峻、古柏等被撤了职，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来往较亲近的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打击，以此进一步孤立和打击毛泽东。

1933年7月，毛泽东搬迁到瑞金沙洲坝元太屋。这是一幢地主的旧祠堂，祠堂门前有一棵百年历史的大樟树。

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博古等人又把毛泽东和邓毛谢古说成是反党小集团，从路线斗争变成敌我斗争，这使毛泽东更加难以承受。他常常来到那棵大樟树底下，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一连好几天不讲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田野，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烟雾缭绕，思绪万千……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沉沦畏缩，他决定暂时改变策略，先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于是，他开始走村串户，了解民情，了解各级苏维埃政府建设，统计粮食数字，组织农业生产，领导大规模“查田运动”……毛泽东一回到群众之中，情绪马上活跃起来，工作十分顺手，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第一手材料，思路更加明确，态度更加坚定。

1933年9月，蒋介石组织了10倍于红军的力量，采用堡垒战术，开始向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反革命“围剿”。战争一开始，毛泽东认真地注视着这些洋学生们所采取的对策。听了博古等人毫无根据地喊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的口号；看到一些红军官兵跟着起劲呐喊的激动的样子，毛泽东心急如焚。

红军在博古等人的组织下，分成4路还击敌人。他们要求红军官兵英勇进击不怕牺牲，从而把一批批红军指战员推向死亡的深渊，把红军创建的根据地一寸一寸地丢给敌人。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前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入他们的耳中，可他们仍然高傲地用

电话施发出各种命令，并不时地呐喊：“坚决顶住！”“加紧修复工事！”“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

看到这一切，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要把红军和根据地都葬送掉！

不久，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李德的到来，开始也使毛泽东放心了些，以为他是一个有专门军事知识的人，那些洋学生们盲目蛮干的举措将会得到纠正，反“围剿”战争有希望了。可是，当毛泽东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听到李德抛出的一套所谓“新原则”时，方知洋先生比洋学生高明不了多少。李德同样主张分兵把口，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李德挂帅上阵，亲自指挥红军作战以后，红军的伤亡却越来越大，县城一个接一个落入敌手。1934年4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的“永久性防线”被国民党飞机夷为平野，红军仅在1天的战斗中就伤亡1200余人。

广昌的失守，表明中央革命根据地危在旦夕，也标志着李德教条主义战术的破产。但是，李德依然亮着嗓子高喊：“无敌铁军！无敌工事！组成铁壁铜墙！坚决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毛泽东气恼极了，再一次恳劝他们必须立即改变战略。许多红军将领也对这种打法提出异议。可是得到的却是一再的压制和嘲笑。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李德、博古等人不得不放弃固守根据地的计划，实行战略转移。

看着红军大搬家似的阵容，毛泽东又一次意识到这些教条主义者身上的包袱有多重，他们的心胸是何等狭窄。象这样的战略转移，不用敌人来追，自己就会被沉重的包袱拖垮。

果然不出所料，当红军到达湘江东岸时，国民党部队调动各路大军，借助湘江的天然屏障，企图把红军锁在口袋里一举围歼。面对强敌的围追，眼看着奔腾不息的湘江水，红军原有的搬家阵势立时乱了套，挑夫们挑着重担不能涉水，所有的辎重部队都乱七八糟地堵在岸上，前面的无法渡江，后头的却源源不断往前涌来，结果人与人相挤，马与马打架，几万人的队伍，绵延几十里的辎重队，陆续堆挤在江边，谁都想赶紧过去，可是谁也无法过去。敌机在上空盘旋，不时投下一片炸弹，顿时浓烟和血肉砂石冲天而起。密集的人群，密集的炮弹，密集的死亡……

眼看这混乱的场面和惨重的死伤，这些洋先生和洋学生们手足无措，那学来的一条一条的“新原则”“新理论”也不管用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会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平的、过火的批评。彭德怀同志十分恼火,他决心和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做中间人。一天,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3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同意了。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行动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彭德怀积在心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抬起头来,轻声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励。有主席今晚这番话,就是现在让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也是帮助了革命。遵义会议上你老彭投的一票是颇有份量的啊!好吧,请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吧。”毛泽东接着说。

在这次谈话开始前,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这时,周恩来同志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讲透,不要错过这个机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 “君子协定”

(河南) 李永芳

会。”

“那好,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说我老彭有错误,我都能听下去;说我老彭有个人野心,反对你,是帮助蒋介石,这样说,即使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认帐。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嘛!……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我也有个思想准备。”

在周恩来同志的促使下,彭德怀最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被彭德怀的话深深打动了,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恩来同志,你不反对吧?”

“我举双手赞成!”周恩来同志说。

(原载 1989 年第 4 期)

起赶到岸边。毛泽东果断地说:“一定要把那批笨重的设备抛掉!”只见他登上一块大石头,高声下令岸上的人马疏散到林中隐蔽,喝令河里的人把身上的机器扔到河里……半个小时后,敌机寻找不到红军的目标,一溜烟跑了。

此时,毛泽东意识到再不能继续等待下去了。从江西到广东,从广东到湖南,一路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谈论着第 5 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谈论着李德鼓吹的“新原则”和“正规战术”;谈论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至此,他们 3 人已经取得了统一认识,在血的事实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能再让这帮人胡作非为了,中国革命的路,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走!

此后,李德、博古的指挥棒不太灵了。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站出来,率领红军部队艰难地渡过湘江,然后绕道贵州,进军遵义,甩开国民党部队的追击。毛泽东在危难之际更显得英明果断,全军上下的心立时向着毛泽东。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人们立时欢呼起来。

毛泽东的这 3 次痛苦等待都是迫不得已的,然而他的等待是成功的。他并不是消极地等,而是在等待中进攻,在忍耐中斗争,促使事物尽快转化。他的思想观点在等待中积蓄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并且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广阔,直至挥出拳头而无敌于天下。

(原载 1990 年第 1 期)



古寺姻缘

(江西) 刘良

在瑞金县城西部约 19 公里处,有一座树木苍翠、怪石嶙峋的独立小山,它便是闻名中外的“长征第一山”——云石山。山上有一云山古寺,1934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沙州坝迁移到此,中执委主席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就在这寺内办公居住。

古寺内有位年方 30 挂零的主持和尚,法号骆仁,人称骆仁法师。骆仁学识渊博,精通梵语佛经,通晓诗词书画和医理,常为附近贫苦百姓看病施药。

毛泽东迁居到云山古寺与骆仁为邻,常和骆仁法师对诗作文,评论时局。骆仁法师敬佩毛泽东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并且健谈诙谐,视为自己的师友。

有一天,毛泽东去会昌作社会调查去了。第 2 天晚上,骆仁和尚在禅房里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正准备睡觉,忽然听见山下吠声大作,人声喧嚷。骆仁和尚正欲去打开寺门看个究竟,就听见门外有人大声叫道:“开门!开门!”骆仁赶紧开门一看,只见七八个彪形大汉举着火把站在门外。为首的是一个猴脸,冲着骆仁阴阳怪气地问道:“和尚,有没有个妇人进你庙里来?”骆仁双手一合道:“阿弥陀佛,此乃佛门净地,施主不得乱说。贫僧不曾看见有人进寺,若不相信,请进庙搜寻一番。”那伙人进去找了一番后便出来了。那猴脸看了骆仁一眼道:“哼!没有?我就不信这刁女人能跑远,追!”说完便带着那伙人朝后山跑去。

骆仁关好大门,回到房间准备上床睡觉,掀开蚊帐,惊得连退 3 步道:“罪过,罪过!”原来床上正蜷缩着一个女人,浑身发抖,惊慌失措地看着骆仁和尚。骆仁惊讶地问:“你是什么人?为何深更半夜躲到这里来?”那女人哭着说:“我被卖在梅山一个有钱人家做媳妇,他

们不把我当人看待,常常打骂,连顿饭都吃不上。我受不了这般生活,便想出逃。我逃到庙里来是想求神仙保佑。”骆仁听了道:“阿弥陀佛,佛主会保佑你的。”那女人见骆仁和尚一团和气,便说:“我叫月英,我要做尼姑,只求温饱……”说完便哀哀地哭个不停。骆仁和尚深深地叹了口气道:“难啦!此地乃为和尚庙,不收尼姑,你若留在此地,不但遭人闲话,更为佛法不容。”月英听了,眼泪又刷刷往下掉,双手掩面,痛苦地抽泣道:“天啊,我月英今天是死到临头,连佛主都不保佑我这苦命的人啊!”骆仁和尚连忙安慰道:“你别难过,佛主不会不保佑的。我给你些钱,你到别处谋生吧。”月英只好含泪离去。

第 2 天晚上,骆仁和尚朦胧中想起昨晚的事情,觉得那女人的声音好耳熟,面容也好象见过,越想越觉得象是他出家前死去的情人凤珠。一想到凤珠,骆仁不由得拿出一块绣着金凤的手帕,默默祈祷。

骆仁和尚出生在广东沿海一个城镇,姓龙,名书文,家里原有万贯家财,奴婢数人。他从小就有个叫凤珠的丫环服侍、陪伴,一直到中学毕业。骆仁爱上了凤珠,决定要娶凤珠为妻,但遭到了父母亲友的坚决反对。为了拆散这对情人,父亲便将他送到波兰去留学。待他返回故里时,凤珠早已被赶出了家门,投海自尽了。骆仁哭得死去活来,一气之下出家做和尚去了。在广东佛山苦度 3 年后,便来到江西瑞金云山古寺,做了主持和尚。此后,每当遇到苦命的女人,便会勾起骆仁的痛苦回忆。

骆仁睡下不久,隐隐约约听见门外有个微弱的声音叫道:“大师父,大师父,开开门吧。”骆仁一听声音非常熟悉,便举烛开门,一看,原来又是月英。骆仁见她遍体是血,赶紧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你为何这等鲜血遍

体？”月英这时躺在寺门口的石阶上，无力地指了指山下。骆仁顺眼看去，远处有几个火把正向这边移来。骆仁和尚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赶紧把月英藏好。待他收拾完把门关上，举着火把的人便来到了庙外。只听来人叫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血都滴在路上了，这刁女人一定进了庙。”说完就“咚、咚”地敲起了门。骆仁和尚开门一看，又是那伙人，连忙把手一拦：“你们深更半夜冲撞寺门，惊扰法圣，佛主会降罪你们的，赶快离开吧，阿弥陀佛。”猴脸怒气冲冲地说：“和尚，我找我家老婆，你念你的经，各不相干。”说完便要带人往里冲。骆仁厉声道：“慢着！要搜寺，好办，只要你们答应一件事。”“什么事？”“如果没找着，那以后你们就休想再进这佛门净地。”“这好办。”“那就请便！”骆仁闪在一边。那帮人搜了好久，来到毛泽东住的东厢房，正要撞门进去，骆仁抢先一步拦住说：“休得放肆，这是毛主席住的房间，不准乱闯。”那“猴脸”一听，改换了口气：“我们只要看看有人没人，决不动里面的东西。”骆仁打开门一看，房内书桌上堆满了书籍，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那“猴脸”见没有人，只好带着那伙人悻悻而去。

骆仁和尚来到香台处，轻轻一按，香台往一边斜去，地上露出一洞口。骆仁连忙要月英出洞，月英却死也不肯出来，苦苦哀求道：“大师父，行行好吧，我一出去便没命了，昨天晚上我出去就被那恶人抓住，捉回家里吊起来打……多亏一位好心人偷偷地把我放了，我只好投到这里来……”月英声泪俱下，“大师父，救救我这苦命的人吧！”骆仁脸有难色，暗想，这和和尚庙私藏一个女子，不仅为佛法不容，而且一旦被外人知道，更是……但一想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个佛家偈语，却又心动了，只好对月英说：“那你就在这儿躲几天吧。”

事后不久，毛泽东从会昌回到云山古寺。一日，毛泽东来到骆仁法师住处，随便翻了翻最近骆仁和尚的诗稿，见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残阳西入寺，空庙一孤僧。
落叶人何安？秋云路几层。
独敲半夜台，闲倚一枝藤。
吾已入空门，岂敢言爱憎。

毛泽东看完后，风趣地说：“据我观察嘛，你两眼神气痴迷，额门泛红，想必是交上桃花运喽。”骆仁脸一红：“阿弥陀佛！身为出家之人，岂敢思动情欲，我想主席是看错了吧。”毛泽东哈哈一笑说：“有诗为证。”骆仁和尚一看纸包不住火了，只好把神台下藏着一个女子的事情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有何难，法师不妨将她留在寺内帮你烧火做饭，缝补浆洗，收拾内外，做个贤内助不是很好吗？”骆仁和尚觉得毛泽东说得在理，但又想那“猴脸”的行为，怕会再来闹，担忧地说：“只怕月英的家人不肯善罢甘休。”毛泽东拍

案而起，气愤地说：“这种人，人民政府会管他。买卖婚姻在苏维埃是决不允许的。”毛泽东思量了一会儿又说：“我马上叫张秘书去处理这件事情。”就这样，月英留在寺内了。

没过多久，骆仁和尚又忧心忡忡地找到毛泽东的秘书小张说：“张秘书，月英留在这里并非长久之计，我看还是送她走好。近来香客中传说我娶了妻室，闹得闲言四起，这样下去如何使得？”小张眼睛一亮道：“依我看，你不如就娶月英为妻，一来可平息长短之舌，二来降福于月英，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吗？”骆仁联想月英的安分贤慧，聪明俏丽，性格也酷似当年的凤珠，若能娶她为妻，便可尽往日之恋愁。虽说身为出家人，但“欲念闪闪过，佛祖心中留”的偈语却又时常促使他向往人世间的天伦之乐。但又想到只是自己一厢情愿，不知月英态度如何，便对张秘书说：“只怕月英她……”张秘书笑着说：“月英你就不必担心喽，毛主席早就做通了她的思想工作，只是看你的了。”

骆仁和月英终于结为百年之好。新婚那天，毛泽东对骆仁和尚说：“昔日唐王朝和尚破酒肉之戒，今天苏维埃法师开结婚之戒，法师可谓佛门之新徒！”

洞房花烛之夜，月英流着眼泪对骆仁说：“恩人，要不是你，我恐怕早已没命了。”骆仁掏出那绣凤手帕替月英揩去眼泪说：“这要感谢毛主席啊！”月英一见那绣凤手帕，接过来细细一看，不由得又失声痛哭起来。骆仁连忙问道：“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第2天一早，骆仁拉着月英奔到毛泽东跟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边笑边哭：“大恩人，叫我骆仁怎么谢你呢？……”毛泽东吃了一惊，忙问：“怎么回事？”原来，晚上月英见绣凤手帕，认出是自己绣的，连问骆仁哪里得来的。骆仁便将自己的身世如实相告，月英听罢也从怀中掏出一块绣着金龙的手帕呈给骆仁，颤声相告：我就是凤珠。两人相抱痛哭。原来凤珠跳海后被人救起，流落他乡，不久又被拐骗到这里。只因相隔10多年，加之龙书文已剃发为僧，凤珠也红颜尽消，2人一直未能认出。没想到今日重逢在云山古寺，真是百感交集。要不是毛泽东作主，恐怕又要各自分散，所以一早就来向毛泽东谢恩。毛泽东听后扶起他俩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人民政府吧。”接着又诙谐地说：“你们历尽劫难能够重新团圆，也是大师你救苦救难自个儿修来的哩！”骆仁和尚情不自禁地诵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撤离瑞金，骆仁和尚为报答毛泽东和人民政府的恩情，在这座寺庙里接送和掩护了许多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在一次护送游击队员转移的路途中，凤珠落入敌手，惨遭杀害。

（原载1989年第4期）